

ZI ZHI TONG JIAN JIE SHAO

资治通鉴介绍

*** 柴 德 广 ***

求 实 出 版 社

QIU SHI CHU BAN SHE

前 言

柴德賡先生(1908—1970)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。他自一九三三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,即到辅仁大学任教,从事教学和史学研究三十余年。解放后,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主任。一九五五年响应党的号召,服从分配,调到苏州江苏师范学院,任该院历史系教授、主任。一九七〇年被迫害含冤逝世。

本书辑录的三篇文稿,都是柴先生调到苏州以后的学术报告记录。

一九六三年,柴先生应北京大学翦伯赞同志约请,从苏州到北大讲学一年。在此期间,曾给中共中央党校历史专业的学员讲课,《资治通鉴介绍》就是根据当时的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。

柴先生曾熟读《通鉴》,对《通鉴》作过深入研究。《资治通鉴介绍》对《通鉴》这部巨著的写作集体、编纂方法、采用史料、胡三省注、以及主要优缺点等,作了较全面详尽的介绍、阐述,有其独到的见解,对阅读《通鉴》有指导作用。尤其是该稿的最后一部分,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应当怎样读《通鉴》,更可作为我们阅读时的借鉴。

柴先生是史学界老前辈陈垣同志早年的学生，几十年间不断向陈老学习，得到陈老的亲切教诲。他的不少论著，深得陈老赞许。师生之间关系密切，经常谈古论今，研讨学术。《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》是他于一九六二年应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同志之请，为该校历史系师生作的报告。文章介绍了陈老学术研究的特点、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、抗战期间著作中反映的爱国思想，内容真切丰富，深入浅出。特别是该稿以较大篇幅谈到陈老撰写的重要著作《通鉴胡注表微》，可作前文参考。

《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》，是他在苏州时的一次报告记录稿。该稿是一九七九年五月江苏师范学院为柴先生昭雪平反时，于其遗书遗稿中发现的。同年八月，江苏师院历史系编辑的内部发行刊物《中学历史教学》拟刊此稿，以为纪念。柴师母陈璧子同志因见原稿所记杂乱残缺，乃命我代为校阅、订正、补充，后在该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发表。这篇文章对初学历史的人有参考价值，还可作为《资治通鉴介绍》有关问题的补充，故一并收入此集。

刘乃和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写于北京师大

目 录

资治通鉴介绍	(1—74)
一 《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	(2)
二 司马光和编写《通鉴》的集体	(9)
三 《通鉴》的史料	(14)
四 《通鉴》的编纂方法	(20)
(一) 限断问题	(20)
(二) 纪年问题	(23)
(三) 起草长编的问题	(28)
(四) 史料的选择问题	(29)
(五) 《通鉴》的考异	(38)
(六) 《通鉴》的“论”	(39)
(七) 《通鉴》的目录	(41)
五 对《通鉴》的评论	(42)
六 胡三省的注	(47)
七 《通鉴》的版本	(53)
八 与《通鉴》有关的几种书	(55)
九 怎样读《通鉴》	(67)
 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	 (75—105)

一	陈垣先生简历·····	(75)
二	陈垣先生史学研究的几个方面·····	(76)
三	陈垣先生的治学精神 ·····	(87)
四	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先生的爱国 思想和主要著作·····	(90)
五	《通鉴胡注表微》 ·····	(99)
六	陈垣先生的思想发展 ·····	(103)
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 ·····		(106—113)

资治通鉴介绍

《资治通鉴》(下面简称《通鉴》)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编年史。它系统地编纂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四〇三年）起，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（九五九年）止，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，是我国编年史中包括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。

我国流传下来的历史书，到司马光那个时代为止，象《通鉴》这样一部三百五十四卷(包括目录和考异)的书是很少的。二十四史中的前十七史到五代为止，内容最多的《新唐书》也只有二百二十五卷。从现在流传下来的史书看，象《通鉴》这样大部头的书不敢说没有，确是很少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过去曾经有过记载，说梁武帝有一部六百零二卷的《通史》，但没有流传下来。

《通鉴》写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，一年不漏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司马光为之花了十九年的心血。对于这样一部巨著，我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，分几个问题加以介绍：《通鉴》作者司马光的情况；编写《通鉴》的集体及其发展经过；《通鉴》的编纂方法及其优缺点；介绍古人读《通鉴》后派生出来的几种书；我们怎样读

《通鉴》等。

一 《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

关于司马光，《宋史》上有一个传。这个传是根据苏轼作的行状(《司马温公行状》)写的。某个人死了以后，把他的生平概略撰述出来，一般都是按年排列，然后请一位有地位的人或死者的门生、亲友写一篇纪念性的墓志，行状就是供做墓志碑文的人参考的。按照苏轼的才学完全可以做司马光的墓志碑文，但是他很客气，只做了行状，而请范缜来做墓志。范缜和司马光是老朋友，俩人非常好，但学术主张却不一样。范缜为司马光写的墓志文也很有意思。他把苏东坡的行状全部抄下来，一点不改。所以，司马光的墓志文实际上是苏东坡做的。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也是根据苏东坡写的行状做的。清朝有名的历史学家顾栋高作了《司马温公年谱》，从司马光出生到死，按年排下来，一共有四本。这个年谱做得很好，关于司马光的传说故事，里面都有。研究司马光，看一看这个年谱很有好处。顾栋高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，他还作了一个《春秋大事表》，还作了王安石的年谱，名《王荆国文公年谱》。

司马光字君实，是宋朝陕州夏县(现在的山西夏县)涑水乡人。正因为他是涑水乡人，又做过一部书叫《涑

水记闻》，是讲当代事情的笔记书，所以，有人称司马光为涑水先生，称《通鉴》为《涑水通鉴》。《涑水记闻》很重要，讲了他和王安石的意见有什么不同。还有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的，这是因为宋朝的官职名称很复杂，还有封爵，司马光死后赠他为“太师温国公”，故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。此外，他还有一个谥法叫文正。所以，君实、司马温公、司马文正、涑水先生都是他。

司马光生于一〇一九年。他处的年代是从真宗到哲宗这个时期。他生于天禧三年，正是真宗的晚年，死于哲宗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年），中间经过了三个朝代，活了六十八岁。在今天看来，六十八岁还很年轻，但在司马光那个时代，六十八岁已经是很老了。司马光的父亲是做官的，在他出世的时候，他父亲正做县官。司马光在仁宗宝元元年（一〇三八年）中进士时，才二十岁，后来一直做地方官，到宋仁宗时改做京官，仁宗末年做到谏官（知谏院），神宗初年是翰林学士。司马光修《通鉴》开始于英宗治平三年（一〇六六年）四月。当时，王安石做宰相。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保守派，他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无效，政治上被排斥，就搬到洛阳。从神宗熙宁三年（一〇七〇年）起，司马光长期在洛阳，投闲置散，从此把全副精力用之于修《通鉴》。所以说，司马光修《通鉴》是在王安石当政时期，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那一段。《通鉴》直到元丰七年（一〇八四年）成书，司马

光已经六十六岁了。第二年神宗死，哲宗立，政局改变，新法罢黜，司马光做了六个多月宰相。

司马光做事很踏实，很谨慎。踏实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在《答刘蒙书》中说自己是“视地而后敢行，顿足而后敢立。”他做事情很认真，很诚恳，不欺骗，也很刚强。他生平没有写过草书，都是一笔不苟地写楷书。他这个人也很固执，主张一旦拿定就不容易改变，毫不妥协。比如，欧阳修和司马光的私人交情是不错的，但是为了一件小事，俩人争得很厉害。什么事呢？宋仁宗没有亲儿子，过继了一个（就是英宗）。这在封建社会是很普通的事情。过继以后，英宗当然称仁宗是父亲，但对自己的亲父亲又称什么呢？一般人称伯伯，或者称叔叔，英宗不愿意。由于他对自己的父亲有感情，不但称仁宗为皇考，对自己亲父也要称皇考。欧阳修认为这是可以的，司马光认为这绝不可以，只能称英宗的亲父为皇伯。司马光平时很尊重欧阳修，欧阳修保荐过司马光，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俩人争论不休，寸步不让。还有韩琦（封为魏公）刺陕西义勇的问题。宋朝有一种制度，把老百姓抓来当兵时，要在脸上刺字，防止逃跑，叫做“刺义勇”。《水浒传》里面说，有人脸上有金印，就是刺的字，这是很不好的制度，是很残暴的事。有一回，陕西正遇到西夏族和宋有战争，韩琦、范仲淹打西夏，韩琦要刺陕西义勇十五、六万人。司马光认为“刺义勇”是害民之

事，完全不必要，而且态度坚决，毫不妥协。后来，韩琦也很佩服司马光。另外，有一个人叫张方平，和苏东坡父子的关系很好，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不错，但司马光却认为他是奸回。既然是奸就是敌人，因而，司马光对张方平的斗争与对欧阳修、韩琦不一样。后来，苏东坡写行状写到张方平时很为难，因为苏东坡父子是张方平提拔的。从上面举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，司马光的确很固执。

王安石比司马光还倔强，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，宁可丢官不做。有一回，当局要他出使辽国，他不去，他说，我从来没有接待过外使。宋朝接待辽使有仪式：北方使臣来了，南方一定要有人接，叫接伴；走的时候要送，叫送伴。王安石给皇帝上奏章，要做念书搞学问的工作，不干招待宾客的事。过去流传有一个笑话，很有意思。说的是当时包拯做过群牧使，就是养马的，是宋朝特殊的官。有一天包拯请客，要客人喝酒，司马光说不喝，王安石也说不喝。包公说不喝不行。后来，司马光喝了，王安石还是没有喝，包公也没有办法。所以，司马光说，介甫比我厉害，比我坚决，我还喝了一点，他一点都没喝。

司马光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，主要表现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上。王安石很有学问，出名也比司马光早，司马光在四十岁以前并不很出名。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一起做

官的时间不短，学术上也互相尊重，本来是朋友。到了实行新法以后，关系就不同了。早在仁宗的时候，民族矛盾尖锐，北边是辽（在今天的河北北部），西边是西夏（在今天的甘陕北部），连年发生战事，军费支出很大。因为宋朝的剥削厉害，社会阶级矛盾也很尖锐，出现了庞大的官僚机构，行政经费开支也很大。所以，无论军事上、经济生产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到宋仁宗初年，范仲淹开始进行改革，在历史上叫“庆历新政”，但没有坚持下来。神宗继位之后，王安石上万言书表示自己的主张，他指出，要“富国强兵”就必须根本改革制度。

司马光和王安石平常讲学问的时候是好朋友，一接触到改革问题上就不行了。拿房子打个比喻：司马光认为，房子不是到了不能住的时候就不要拆，能勉强住的就要修修补补。他的意思是不要大改，即使要改，也要一点一点的改。相反，王安石认为必须大改，房子要拆掉重盖。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。分歧最大的：一是差役还是免役，二是青苗法的问题。王安石实行的新法里面包括许多法，重要的就是免役法和青苗法。原来规定的差役，是对有一点财产的家庭实行的，对真正的贫户不派差。事实上，有钱的人家并不服役，服役的还是穷人，主要是农民。王安石认为应当改，只要有财产的人家出一点钱就免役了。司马光不赞成，他认为原来不出钱的人家，现在非要他出钱，这不

好。对于青苗法，王安石认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给农户一点钱给予帮助，对生产有好处，是好事。司马光却认为这对富户有好处。由于政治观点不一致，两人的交情也慢慢破裂了。破裂到什么程度呢？王安石做了宰相，宋神宗希望两边的人都用，王安石也用，司马光也用。司马光说，用王安石我就走。王安石也认为，既然用我就不能用他。当时曾经要司马光当枢密副使，这是管军事的首长，司马光不干，却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，后一直在洛阳十五年。在这十五年里，司马光还是有官职的，在洛阳时是翰林学士，后来做了提举嵩山崇福宫。这种宫官是由于宋朝从真宗起就信仰道士，搞天书而设的。所谓“宫”，是指道士庙，提举就是管理道士庙的。其实，庙里有什么可管的！还不是给他一个高薪。司马光做了四任提举嵩山崇福宫，是在野的。直到王安石完了，神宗死了以后，他才上台。

对于司马光、王安石这两个人怎么评价，是个专门的问题。从他们的阶级出身来讲，分别不大，都是官僚家庭。司马光父亲的官不大，王安石的父亲开始也是县令，后来都有相当的地位。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来看，司马光的主张在客观上对大地主有利，王安石的主张在客观上对农民有利。至于王安石执行得好不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办法和执行是很复杂的问题。现在有一种简单的说法，说司马光代表大地主，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。

这是个复杂的问题，要说清楚很不容易。

关于司马光这个人的经历、性格、思想，大致如上所述。当然，研究司马光不那么简单，这个人思想复杂，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。例如他反对孟子，对《孟子》这部书很怀疑，对杨雄著的《太玄经》很欣赏。司马光做宰相只有几个月，由太皇太后（哲宗的母亲）主持，他把王安石的新法都推翻了，全都恢复到以前的状况，这也有点过分。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，可能有些东西老百姓不习惯，经过十四、五年，也慢慢习惯了。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里说，司马光在洛阳十五年，做了一件好事，写了一部《通鉴》。离开洛阳到朝廷，做了一件坏事，把十五、六年以来大家都习惯了的新法又全部反掉，搞得连自己部下也不赞成，苏东坡父子也表示反对。当时，司马光说要在五天中把免役法改为差役法，全国谁都没有做到，只有蔡京在开封府做到了。于是，司马光对蔡京大为赞赏，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。实际上，蔡京是个投机分子，是借这件事抓权。最后，要把司马光诬为奸党的就是蔡京。司马光尽管政治见解是保守的，在王安石实行新法时处于反对派的地位，但他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在人品上还是不坏的。在《通鉴》里，表现司马光折衷思想的地方很多，他和王安石的斗争也不能不有所反应。

二 司马光和编写《通鉴》的集体

司马光是怎么想起编《通鉴》的呢？司马光想编一部书，把从战国开始到五代这个阶段的历史编一部书。他最初作的书叫《历年图》，把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（赵匡胤即位前一年）的历史编成一个简单的年表，也就是现在《通鉴》所包括的年代。《历年图》是在英宗治平元年（一〇六四年）做出的，到了治平三年四月，司马光开始修《通鉴》。修《通鉴》以前，他已编成了一部名叫《通志》的书，共八卷。《通志》是《通鉴》最老的名字，是《通鉴》的样本，是从战国到秦的八卷编年史。英宗皇帝看了《通志》，认为很好，命司马光选助手，继续做下去，于是，司马光正式修《通鉴》。最初并没有《通鉴》这个书名，也不叫《通志》，称为《论次历代君臣事迹》。到了第二年（治平四年）十月，英宗死了，神宗即位，才给书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自作了一篇序。这篇序后来起了作用。司马光死后，蔡京当政，立元祐党人碑，以司马光居首，要把司马光定为奸党，夺他的官，禁他的书，把新法推行不好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司马光，连他的封号都革掉了。当时，姓司马的人都成了问题，搞得很厉害。有一个人姓马，叫马纵一，他的官名是排岸司，连起来就是“排岸司马纵一”。有一次，

他去见上司，上司一听他的名字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姓司马？”后来他就不敢用司字，成了“排岸马纵一”。蔡京要废掉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一看有神宗皇帝的序。有人说不能废，把皇帝的序都废掉了是要闯祸的，蔡京才不敢废掉《通鉴》。

《通鉴》一共修了十九年。这十九年，正是司马光从四十八岁到六十六年的时间，也是他的学问成熟的时期。但要做这样一部大书，必然需要助手。司马光遵照英宗的命令自己选了助手，而且是选用了当时第一流的人当助手。元丰七年（一〇八四年）十一月进呈《通鉴》的表文中，助手也列了名，他们的次序如下：

检阅文字——司马康

同 修——范祖禹

同 修——刘 恕

同 修——刘 攽

编 集——司马光

这几个人在《宋史》中都有传记。

司马光首先选了刘恕。刘恕比司马光小十三岁。司马光四十八岁开始修《通鉴》时，刘恕只有三十五岁，是一个县令。司马光是怎样认识刘恕的呢？司马光在三十一岁那年做过一回考官，十八岁的刘恕去应考。刘恕在省会试时考了进士第一，殿试时没有考取。宋朝的考试和明清不同。明清时，你如果会试时考了进士第一，殿

试时没有考上，仍然保留你的功名，下次再考。宋朝不一样，如果会试时考取了，殿试时没有考取，不保留功名，下次还得从头再来。当年，司马光是统考官，所以认识了刘恕。《宋史》四四四《文苑传》云：刘恕，字道原，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人。司马光编次《资治通鉴》，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。光对曰：专精史学，唯刘恕耳。即召为局僚。关于这件事，《温国文正公文集》六五《刘道原十国纪年序》也有记载，还说：“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，则以诿之，光蒙成而已。”刘恕死于元丰元年（一〇七八年），只活了四十七岁，在《通鉴》著成前七年就死了。

刘攽是《后汉书》专家，比司马光小四岁。《宋史》三一九本传说：刘攽字贡父，临江新喻人（今江西新喻），与兄敞同登科，仕州县二十年，始为国子监直讲。熙宁中，判尚书考功，同知太常礼院。尝诒安石书，论新法不便，斥通判泰州，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、户部判官知曹州。为开封府判官，复出为京东转运使。徙知兖、亳二州。黜监衡州盐仓。哲宗初，起知襄州。从他的经历来看，一直在州郡和京师做官，没有居洛阳。他只修两汉部分的长编，和司马光不可能当面商谈《通鉴》的工作。在初稿作完以后他就不管了。所谓初稿，今天我们叫长编。

范祖禹是范镇的侄孙，比司马光小二十二岁。他参

加修《通鉴》虽然晚了三年，但搞的时间最长，约有十五年，一直在洛阳，始终没有离开。《宋史》三三七附其从祖《范镇传》说：祖禹字淳甫，一字梦得。幼孤，叔祖镇抚育如己子。进士甲科。“从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在洛十五年，不事进取。书成，光荐为秘书省正字。”《温国文正公文集》四十五有元丰七年《荐范祖禹状》说：“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，臣已识之，今年四十余，行义完固，常如一日。”“臣于熙宁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资州龙水县事同修《资治通鉴》，至今首尾一十五年。由臣顽固，編集此书久而不成，致祖禹淹回沈沦，不得早闻达于朝廷。”由此看来，范祖禹在同修书诸人中年龄最小，在书局时间最久，贡献也最大。

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进馆也不晚，也是搞了十几年。

以上几人都是经过皇帝同意的，不是私人招的，编修《通鉴》所需要的全部开支都由公家出。所以，《通鉴》实际上是官修的书。编《通鉴》这个集体不大不小，一共五人，并且年龄一个比一个小。始修《通鉴》时，司马光四十八岁，刘攽四十四岁，刘恕三十五岁，范祖禹才二十六岁。范祖禹进馆时二十九岁。至于检阅文字的司马康只有十七岁。这是一个老少结合的写作集体，很值得注意。司马光在修书过程中，曾经病过一回，很危险，司马光已经写了一个表。表里面说的是什么呢？还是反对王